



以歌为“家”：唱着苗歌去打工

■本报记者 吴桐

演出已经开始了，张腰往和张春花姐妹俩才到。衣服也来不及换，穿着毛衣和羽绒服就匆匆登场。上场后，张腰往的手机还在台下拼命响，观众席里有人皱了皱眉。是正赶过来的老乡打的，大概是找不到路了。

张家姐妹身旁站着梁描讲和杨梅，早已换上家人千里迢迢寄来的节日盛装，这是第一次在上海穿戴。衣服上复杂的纹样是她自己绣的，“要一年才绣一件”，头上和身上的贵重银饰，也已压箱底许久。

台上的4位苗族阿姨，都是50岁左右，她们来自同一个地方：贵州黔东南凯里市凯棠镇。她们靠老乡“一带一”来到上海，在城市各个角落做保洁阿姨。梁描讲在M50创意园区，杨梅在7号线常熟路地铁站，张家姐妹在岚皋路的一个商场。

苗族女人总有唱不完的歌。她们谈恋爱的时候唱情歌，结婚后唱酒歌，人到中年了，就聚在一起唱相约歌。阿姨们很爱唱相约歌，相约歌就是大家聚在一起，相互倾诉，感慨人生，歌词常常是即兴的。然而，在故乡随时随地张嘴就唱，来到上海便不太敢放声歌唱——上班的时候如果大声唱会被投诉，下班回到家唱，又怕影响到邻居休息。

苗族女人吃苦耐劳，来上海工作几年几乎从没请过假。但2019年12月29日这一天，她们各自请了假，从四面八方来到震旦博物馆。台下坐了近百位观众，全是来听她们唱歌的。

直到开演前两分钟，她们才确定了唱歌的顺序。第一首歌是一首飞歌，《爬上高山好地方》。什么是飞歌？飞歌高亢嘹亮，可以飘过山头，唱给山那边的人听。上海没有山，只有高楼。她们此时所处的震旦大厦，就是无数高楼中的一幢。但一唱起苗歌，他乡就成了故乡。

漂泊之歌

邀请这些苗族女人来唱歌的，是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熊曼谕。她的硕士论文开题报告上个月刚通过，题目是《沪苗族务工妇女的音乐生活》。

2018年4月，熊曼谕的导师、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萧梅在朋友圈看到，半度音乐的创始人小草说她在M50创意园区的一间洗手间里，听到有个保洁阿姨在唱苗歌。于是，萧梅在自己的学生群里发布了这个消息，问谁有兴趣关注苗族妇女在上海的音乐生活。

那时熊曼谕刚通过研究生考试，这是她进群后收到的第一条群消息，并未多留意。直到大半年后，萧梅再次跟她提起这个课题，熊曼谕有些犹豫，此前她所想象的田野调查，都是去遥远的地方，研究一些异文化，没想过要在大都市里做田野。考虑再三，她还是来了梁描讲的微信，加了好友。然而对方迟迟不通过好友申请，电话也不接。

一开始就碰壁，熊曼谕想，这课题怕是做不成了。

两个月后仍无回音，没办法，熊曼谕只好去M50碰运气。那么大的园区，她靠着一张微信头像，竟然找到了梁描讲。

“我想听您唱苗歌。”她对梁描讲说。

没想到这一见，原本的隔阂很快消失了。站在苏州河边，梁描讲用苗语唱起一首相约歌：“我这一生一直漂啊漂，如同流水一样白活了……”一年后的那场音乐会，主题为“我如水漂泊的一生”，灵感就来自这句歌词。

在梁描讲工作的M50创意园区，有许多画廊。一间画廊的橱窗里，挂着一幅苗族女孩的画像。画中人穿着红黑相间的传统服饰，露着小蛮腰，双手搭在颈间精细复杂的银饰上，笑盈盈地注视来往行人。看到这幅画时，熊曼谕突然觉得很讽刺：这就是人们心中对苗族女人的美好想象，浪漫、诗意；而那个真实的苗族女人，正弯着身子，在画廊门口一遍又一遍地挥动扫帚。

梁描讲今年47岁。她16岁结婚，不久后随着老公离开家乡，先后辗转武汉、大连等地，卖苗族银饰；后来银饰生意不好做了，就跟着老乡一起去昆明擦皮鞋。大约3年前，他们到了上海，两个人在不同的公司做保洁。

夫妻俩有三个孩子，大儿子在贵州工作；二女儿在广州的工厂里打工；小儿子还在山西上大学，成绩不错。夫妻俩为了多赚点钱，每人打两份工，今天在这里上班，明天在那里，没一天休息日。他们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出租屋里，屋子七八平方米，月租七八百元，进门就是一张床，再没有多余的地方落脚。

因为梁描讲，熊曼谕又认识了在七号线常熟路地铁站做保洁的杨梅。杨梅今年50岁，住在宝山区场中路一间15平方米的房子。杨梅和她的丈夫，杨梅的妹妹和妹夫，还有一位表哥，5口人，日常起居，全在这15平方米内。一张上下铺的铁床，一张双人床，用褪色的旧床单围着，构成一方小小的私密空间。中间是一



梁描讲、杨梅、张腰往、张春花登台演唱第一首歌，迟到的张家姐妹还没来得及换上节日盛装。

张珊 摄



熊曼谕试穿杨梅的苗服。

张珊 摄



在凯里老家，梁描讲和家人朋友们唱起酒歌。

熊曼谕 摄

张小方桌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锅碗瓢盆。阳台上还有一张单人床，表哥睡。

杨梅编过一首歌词，《在上海打工》，讲的是她自己的故事，翻译过来是这样的：

“针底断线丝，我命如残身。来到上海场，去扫地也行。得到些银两，去培养后生。心干意也绝，咱别再操心。随它怎么样，别再想那些。多想招人讽，淡如刷锅水。倒入屋后沟，鸭子也不喝。”

返乡歌唱

来上海3年，梁描讲和丈夫都没回老家，一是舍不得过年期间的三倍工资，二是心疼路费。2019年3月，梁描讲的女儿生了孩子，她才和丈夫第一次回家，熊曼谕也跟着去了。

熊曼谕现年23岁，母亲不放心她跟刚结识不久的异乡人回乡，也跟了去。作为研究者，熊曼谕总想着书本上那些关于田野调查的术语——“跳入”“跳出”“主位”“客位”，而母亲常常对她说：“不必有负担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人和人的相处。”

她们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，从上海到贵州凯里，然后坐了半天大巴，从凯里县城到凯棠镇。梁描讲的女婿开车到镇上来接，才终于进了山。

梁描讲家是一幢老宅子，比起在上海的出租屋，宽敞了数倍。女儿家是新修的，更加亮堂。一回到家，梁描讲就忙前忙后，待客接友，一刻不闲。只是山里的三月，不仅气温低，也没什么人气。春节已过，在外打工返乡的人又候

鸟般飞走了，剩下的大都是老人和孩子。

虽然人不多，饭桌上却也十分热闹。面对从上海远道而来的客人，大家拿出了好酒好菜招待，酒杯一端就放不下，一次又一次地倒酒，一遍又一遍地唱起酒歌。熊曼谕望着饭桌上好客的女主人，突然觉得她好像变了一个人——自由自在，想唱就唱。

今年过年，熊曼谕又要去凯棠镇。这一次，邀请她的是杨梅。邀请的时候，杨梅反复念叨：“就是家里很穷，没什么东西招待你哦。”

去年过年杨梅没回家，今年早早请了10天假，其他在上海的苗族阿姨们都请了10天假。因为今年大年初二，村里会有盛大的“姑妈回家”活动。

“姑妈回家”的习俗，跟汉族的“回娘家”有些相似。在这一天，出嫁了的姑妈们，要领着姑爷，带着礼物回娘家。大家会穿上传统服饰，抬着美酒美食，一路踏着芦笙曲的节奏，把苗歌唱个够。到了大年初七，杨梅要参加亲戚的婚礼。她邀请熊曼谕和她一起，打扮好，去迎亲。

上一次去凯棠镇，村里人少，熊曼谕没怎么看到大家一起唱苗歌的情景，只能看梁描讲给她的村里人“三月三”对歌的碟片。这一次，她终于可以看个够了。熊曼谕的父母照样随行，他们要去看望去年结识的苗族朋友。

一年过去了，一切都在慢慢改变。如今梁描讲每次把熊曼谕介绍给别人时，都称她为“我的小熊”，俨然把她当成自己在上海的女儿。熊曼谕从一开始不知如何与阿姨们聊天，到常常去阿姨家蹭饭，还介绍父母与阿姨们相识，就好像彼此都多了一些亲人一样。

隔空对歌

实际上，第一次见梁描讲，在苏州河畔听她唱起第一首苗歌时，熊曼谕就萌生了为阿姨们办一场音乐会的想法。然而，这个想法曾遭到一些同学质疑：为什么一定要为苗族阿姨们办音乐会？观众会不会只是猎奇，来看热闹？这场音乐会是否会给她带来更多困扰？

阿姨们也有许多担忧：唱不好怎么办？大家听不懂怎么办？大家不喜欢怎么办？

在微信群里对歌，在“全民K歌”上录歌，她们都很擅长，但她从未面对过这座大城市里的这么多观众。

为了讨生活，许多苗族女人离开家乡。年少的时候在家乡，过节唱，不过节也唱，面对面唱，隔着山头也唱。如今，散落在天涯海角的他们，依靠互联网，依靠聊天软件，继续对歌，对抗孤独，驱散乡愁。

刚吃过晚饭，在场中路的出租屋里，杨梅拿起手机就用苗语唱了起来。QQ里的“黔东南十大歌王”交流群有1998人，微信上“苗歌响起黔东南”“有缘千里来相会”的对歌群，每天晚上都很热闹。

杨梅的唱词十分简单，翻译过来是：“你下班了没有？吃饭了吗？吃了饭，出来唱歌……”唱完发送过去，就等着对方用歌声回应。上班的间隙，杨梅偶尔也会在地铁站狭小的员工休息间里，对着手机唱几句，“干活就干活了，有一点空闲时间，就悄悄唱一唱。我喜欢唱得很，心里想到什么就唱什么。”

“我和我老公就是对歌认识的。年轻的时候，他在我家门口唱。他唱一首，我唱一首。”杨梅说。去年10月，她丈夫离开上海回了家乡，到晚上，思念了，夫妻俩会在手机上隔空对歌。

除了在聊天软件里对歌，阿姨们还会在“全民K歌”软件上唱歌过瘾。这不，张腰往又发了新歌，她的头像是穿着苗族传统服饰的模样，网名叫“美酒加咖啡”。她选了一首流行歌《又是落雨飘零的秋》，配上自己新编词的苗歌，还加了点电音，乍一听已经听不出来是苗歌。苗歌群的朋友们转发捧场，没过多久播放量就过千了。

这些苗族阿姨，很多都不识汉字，但用起K歌软件来，却花样百出，顺手得很。

2019年10月2日，熊曼谕去了张腰往家。那里离杨梅家不远，三四家人挤在一套出租房里，每家一个房间。那天正巧赶上好几个阿姨休假，那是她们国庆七天长假里唯一的一天休假。见熊曼谕来了，大家就聚在一起对歌。虽然住在一起，但每天上下班时间不同，像这样聚在一起对歌的机会，一年也没有两次。熊曼谕想学，阿姨们就教她一首《春之歌》。先是一个字一个字教苗语歌词的发音，熊曼谕用自己的方式记在纸上；然后一句一句教调子，四五个阿姨轮流教，从下午两点教到晚上七八点，大家也不嫌累。

一个月后，音乐会正式开始筹备，大家都很高兴，但梁描讲有了新的担忧——“好多老乡想来，又不认得路怕走丢，所以不敢来。”

有个老乡刚来上海时，有天下班回家真的走丢了，找到她的时候，她说：“上海又没有山，我怎么找得到路回家？”上海的路平平稳稳，对她们来说，却永远没有家乡的山路好走。

演出当天，震旦博物馆一共来了9个苗族阿姨，4个唱歌的，5个观众的。为了不迷路，她们先集中到常熟路地铁站，由熊曼谕的父母统一接去博物馆。

这是她们第一次到陆家嘴。

以歌为家

关于苗族妇女的课题，源于熊曼谕的导师萧梅的一个心结。2003年，萧梅正忙着为侗族大歌申请联合国非遗。当她和同事到了黔东南黎平县，发现侗族大歌传承的最大问题是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，家乡没有人唱歌。黎平县的人都去哪儿了？萧梅问。一个是浙江奉化，一个是广东东莞。萧梅当时就对黎平县的领导说：“你们与其不断请我们这些外乡来的研究者考察和书写，倒不如到奉化、东莞去，通过农会、工会组织他们唱歌。不能在家乡唱，就在打工的地方唱。”

当萧梅发现这群在上海当保洁阿姨的苗族妇女时，她的第一想法并不是做研究，而是想组织这些漂泊异乡的人一起唱故乡的歌。

20年前，萧梅写过一篇文章，《没有歌唱的生活是野蛮的》。里面写到1995年，她到新察布查尔考察，认识了一位爱喝酒、爱唱歌的71岁老汉，名叫安得荣。他每天都骑着自行车，一只手持车把，一只手持着他的曼陀铃，云游弹唱，以歌会友。

安得荣的一句话让萧梅终生难忘：“有人说，没有劳动的生活是盗窃的生活。我给加上一句，没有歌唱的生活是野蛮的生活。”

苗族阿姨们的生活中，也不能没有歌唱。在震旦博物馆举行的这场音乐会上，阿姨们唱了5首歌，有飞歌，有酒歌，还有相约歌，唱的全是她们的生活；从下地摘苞谷，到上山砍柴，从故乡的景色，到上海的打工生活。

熊曼谕也穿上苗族服饰，跟阿姨们合唱了一首《春之歌》。为了练发音，她还进了一个学习苗语拼音的群。

阿姨们唱了一首酒歌送给小熊，歌词是自己编的。杨梅在台上说：“我们从家里来上海打工，小熊请你们来这里唱苗歌，请你们大家不要见笑（笑），谢谢你们！”

观众席里，坐着同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晋。他年轻的时候去过凯里，在那里曾被侗族人的热情震撼过。“吃着吃着饭，他们突然就跟你唱起来了。”他还去过云南和四川，春天的时候跟着摩梭人的妇女下地干活，累得半死时，突然所有人都开始唱歌，唱的是“兄弟姐妹们在一起生活，就像花一样美丽”。陈晋说：“那歌声非常简单，非常朴实，但就像海德格尔形容梵高画的那双破旧的皮鞋一样，说它是敞开的，雾气消散，让人看到其中无限的可能性。我觉得这是艺术最大的意义。”

短短的音乐会结束了。有的观众离场，有的留下来谈论着什么，有的围过来，想要加阿姨们微信。没唱够的阿姨们拎起外套，又唱起一首欢送宾客的酒歌。

第二天，梁描讲把微信头像换成了音乐会演出的照片。

究竟为何执意要帮苗族妇女开音乐会？熊曼谕说，她没想太多，单纯地想送给她们一份礼物，创造一个机会让她们放声歌唱，让更多人听到她们的歌。她想告诉阿姨们，“即使人生如水漂泊，我们仍可以以歌为家”。



美景不止于方寸之间

回归自然生活·拥有健康人生